

【论 文】

语言与族群性：广定远锡伯/满洲认同的研究¹

甘德星²

一、广定远的困惑：语言与认同

广定远是 80 多岁的锡伯族老人，来台湾快 60 年，但一直到现在还说着标准纯正的锡伯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自出生到青少年时一直住在新疆伊犁察布查尔锡伯族县七牛录（乡）层层封闭的空间内。当时新疆与内地隔绝，伊犁“自成一国”，七牛录由城墙包围，广家大宅又是一个四合院。广定远在如此一个封闭的同质空间内成长，他的认同，除了锡伯，别无其他更有意义的选择。因此，他的锡伯认同可以说基本上是原生的。广定远后来离开新疆来到台湾，他唯一剩下较为明显的族群标记就是他的母语锡伯语。锡伯语和满语基本上相同³，但说锡伯语的人就等同于满洲人吗？如果不是，那为什么他有时不自觉地流露出满洲人的认同？如果是，广定远的认同满洲是否又如支持工具论的学者所说是出于“建构”？有关他的认同对象，一直到最近仍困扰着说锡伯/满语的广定远。

自 2015 年起，我断断续续地和他做了多次的口访。在访谈中，他提到他的家世背景、新疆的封闭空间、台湾的满文教学等等。下面，我将以这三个主题为基础，透过语言与认同的关系，考察他由语言到族群，再由族群到国族认同。

二、家世背景：满洲驻防锡伯营之后

广定远，1935 年 1 月 8 日生于伊犁七牛录，正蓝旗人⁴。锡伯名 Arbutun Saiin⁵，汉译十善，名字由喇嘛所取⁶，姓孔果洛（Kunggur）氏。到台湾前，汉名译作孔十善。广定远是到了台湾后，为报户口才由父亲广禄所改，所据为汉代平定西域名将班超的封号“定远侯”。

曾祖父穆隆阿本务农，同光回乱，入荣全侯爵幕府，乱后复退隐田园⁷。祖父富勒枯伦（Fulun Gurun），号春圃，任锡伯营副都统衔领队大臣⁸，直到清末民初仍保有此衔⁹。祖母吴扎拉氏，名字不清楚，因为家内不可直呼长辈之名，连夫妻间也不可以，只能叫“孩子的妈”（eniye ni）或“孩子的爸”（ama ni），当地人用维语、哈萨克语称她做 mamai，即老太太，以示敬意。广定远

¹ 本文发表于《西域文史》第十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 年 6 月，第 319-334 页。

² 作者为台湾 中正大学 历史学系 教授。

³ 锡伯族简史编写组《锡伯族简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 年，第 97-103 页。

⁴ 锡伯营八旗分左右两翼：镶黄旗（一牛录）、正白旗（三牛录）、镶白旗（五牛录）、正蓝旗（七牛录）四旗为左翼；正黄旗（二牛录）、正红旗（四牛录）、镶红旗（六牛录）、镶蓝旗（八牛录）四旗为右翼。

⁵ 由于穆麟德满文转写不能正确还原为满文，本文的满文转写依据甘德星《满文罗马字拼写刍议》，《满学研究》第六册，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年，第 50-68 页。

⁶ 此喇嘛似为蒙古人，常住于广家。

⁷ 广禄《七十自述》，载锋晖编《广禄回忆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138 页。此文原于 1973 年在台湾出版，无出版地点。

⁸ 广禄《七十自述》，138 页。吴元丰、赵志强《锡伯族历史探究》，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 年，367 页载光绪 28 年富勒枯伦升任总管。按锡伯营设领队大臣1 员，随伊犁将军驻惠远城，下设总管、副总管各 1 员，办事机关“总管档房”设于本营六牛录。

⁹ 辛亥革命后，清朝虽然灭亡，但伊犁锡伯营仍保留。见吴元丰《清代伊犁锡伯营综述》，《满文档案与历史探究》，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5，第 261 页。



说 mamai 一字实源自锡伯口语[mamə], 即祖母之意, 满语作 mama¹。伊宁市与察布查尔间无桥梁, 祖母捐赠联系伊犁河两岸以滑轮拉动的俄制双体浮船及钢缆, 赢得美名。祖母外出时, 分三辆马车, 一辆自用, 一辆带丫鬟, 一辆载用品, 甚有气派。

父广禄, 字季高, 五兄二妹, 排行第四。父亲广姓应据其家中字辈排行而来。广禄长兄名巴达兰, 即满文的 badaran (广)², 二兄名广安, 与长兄同属一房; 三兄广寿、五弟广睿与广禄同属另一房, 妹香姬³。广禄幼承庭训, 知晓四维八德儒家思想, 爱国爱群之理。初只习满文, 至入高小时始学汉文、汉语⁴。

广禄有三房。一房石菊香, 五牛录人⁵, 说吉普西语, 属科尔沁蒙古方言, 音近达呼尔语⁶。头发棕色, 似属所谓的黄头室韦⁷, 生子九善、十善。二房乃德裔俄罗斯贵族, 为圣彼得堡大学物理教师, 生女儿塔妮亚 (Таня), 后亦为大学老师, 塔妮亚比广定远小一岁。三房苏美琳·瓜尔佳 (Mergen Gōwalgiya), 三牛录大户人家, 母名苏楞额·富察 (Surengge Fuca), 父苏勒春 (Surecun Gōwalgiya)⁸, 曾专责管理由俄国逃难至新疆的哈萨克族千户长。苏美琳与广禄在迪化 (今乌鲁木齐) 成婚, 生一子广树诚。苏美琳之兄苏精一, 锡伯名 Wekjingge Gōwalgiya⁹。

广禄曾任塔什干总领事, 除广定远因太年幼外, 其子女及侄儿, 如广定远大伯子长寿, 二伯子二善、三善、四善、五善、六善、七善¹⁰, 三伯子八善, 兄九善, 广定远堂姐广玉清多在俄国留学。二善俄文很好, 曾任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县长, 九善曾二度出任伊犁海关关长, 并二度为毛泽东主席接见。广玉清, 盛世才时代曾任伊犁俄罗斯中学俄语教师,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又在国际大学教授俄语, 并任北京党政军高层俄语翻译。

三、察布查尔: 音近满洲

20 世纪 30 年代, 位于新疆的伊犁是个相对封闭的城市, 与其联系较多的是俄国。俄国, 由于地缘关系, 对伊犁地区的影响甚于内地。在伊犁的俄罗斯社区设有医院、电影院、书店、咖啡馆、马路, 马路旁的水沟, 其去水功能甚佳。俄国物品如留声机、制造奶油的机器、糖果、烟酒、肥皂、布匹都能在伊犁买得到。四轮车 (以前多用二轮大木头车)、三头马车、雪橇都从俄国引入。伊犁的火柴厂是汉人先从俄国人学会后带去伊犁。这些汉人多为俄国华侨, 由山东经东北到俄国, 再从俄国到新疆。种牛痘法也是从俄国引入。但俄国的影响并没有改变伊犁一

¹ 山本谦吾《满洲语口语基础语汇集》, 东京: 东京外国语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 1969 年, 第 37、852 页。

² 广禄的满文名字不详, 若据其汉名还原为满文, 或可作 Badaran (gya) Fengšen。

³ 广禄另一妹的名字不清楚。

⁴ 广禄《七十自述》, 第 138 页。

⁵ 广定远说五牛录的人, 原为锡伯中的少数群体, 所说的锡伯语基本上是书面语。其母睡觉时, 头朝外, 脚朝内, 与其他锡伯人不同。

⁶ 锡伯族简史编写组《锡伯族简史》, 第 97 页。

⁷ 隋唐时, 留在大兴安岭未南下中原的鲜卑人, 部分称为黄头室韦, 后来演变为锡伯人, 达斡尔人据说也与之有关。辽代, 黄头室韦定居于嫩江下游的乌裕尔河流域。金时因避契丹讳, 改称黄头女真。到元代, 锡伯人并入蒙古科尔沁部。明末, 科尔沁部往投满州, 依附其下的锡伯人也分别编入各旗, 成为蒙古八旗的组成部分。据宋人洪皓《松漠纪闻》的记载, 黄头室韦“髭发皆黄, 目精多绿亦黄而白多” (见《松漠纪闻》, 《百部丛书集成》四六, 第九函, 台北: 艺文印书馆, 1965 年, 叶八正), 这应是族名的由来。同时代的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和叶隆礼的《契丹国志》也有相同的记载。

⁸ Gōwalgiya, 苏美琳自拼作 Guwargiya。见 Mergen Guwargiya, “Enduringge Šuxowan [Šuxōwa] i Ulabun,”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h'ing Archives Symposium*, ed. Ch'en Chieh-hsien,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978, pp. 170-177.

⁹ 苏精一本人将满文名字转写作 Vecjinggha Gwalgiea。见山本谦吾《满洲语口语基础语汇集》, 第 11 页。

¹⁰ 七善是否二伯之子, 因广定远记忆模糊, 有可能误记。



直以来的封闭性。

察布查尔位于伊犁河南岸。1930年代，察布查尔，一如清代，基本上仍是个军事管制区¹。当时的锡伯族，各住于八牛录的城内，由于地理位置偏僻，锡伯人到内地并不容易，进出内地需领有路条，始得通行。同样，内地人要到新疆也得领有路条。一般人，除了卖针线，布匹等杂物的小贩外，不得随便进入各牛录城内。这些小贩，为了做买卖，多能说简单锡伯语。正由于处于封闭的环境，锡伯的语言得以在察布查尔普遍留存。与东北满族，因为早已汉化，大部分人已不能说满语，成一强烈对比。广禄说：“满清政府眼见东北满洲人日渐汉化，故为欲保护这一部份人不再汉化起见，划锡伯营地区为‘封锁区’不准其他族人自由往来，这样才保持了锡伯族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未被同化。”²

小时候，广定远就住在七牛录城内。七牛录城，如其他各牛录，四面有墙，也是个封闭的空间。城的四角各有角楼，上有枪眼，以作防御。四个城门只有北门有城楼。城门旁是门房，紧贴门房的是关帝庙，关帝庙旁是运动场。城北至城南由一中央大街贯穿，与连接城东城西的大街，交叉成一十字形。十字街两旁都植有榆树、柳树、白杨树。牛录办公的地方位于十字街中央的左下方，称做 *dangse boo*，即“旗下档房”，是牛录的办公地方，内有公粮仓库、马廄、监房。十字街的左上方是小学。右上方是福利部，售卖日常用品如糖、盐、香烟、酒、布匹。右下方是俄式俱乐部。广家位于城南，横垮城内的第一街和第二街。大伯 (*amba ama*) 住于大宅左边；二伯 (*jaci ama*) 则住于大宅后的对街上。三伯跟广禄住在一起。城的东北角有苗圃。西南角则是义学所在³。

广定远在七牛录城的住处，面积约 3,300 平方米 (约 1,000 坪)，可见是城中大户。广府大院坐北朝南，是传统的二进四合院，四面围以墙，大门 (*amba duqa*) 靠近城墙南面。大门为厚木板，上有铁环。大门前有影壁，由灰砖砌成，虽然并不华丽，但在察布查尔，大门前有影壁的，就只有广府一家。这应与其家族历任锡伯营领队大臣有关。

进了大门后便是一个偌大的院子，即前院。右边是西院，有仓库、牛舍、马厩、羊圈、猪舍，养有牛若干头、马十多匹、羊数十头、猪五六只。牛车、马车和汽车也停放在这个地方。冬天用的饲料苜蓿草堆放在屋顶上，以免被饲养的动物吃掉。左边是东院，有磨房、粮仓。

从前院往前走便是大院的二门，门稍向右偏，不对着大门开，以免进门后直接看通后院 (内宅) 的房间。二门后有灰砖砌的中间走道，略高于地面，以方便下雪或下雨时走动。走道右边为客房三间，左边有客房四间。

后院的中间走道直接通往大厅，大厅后室供奉先祖的朝服、孔雀毛官帽，其意与满洲王府内的遗念殿相同⁴。大厅右边是正房，是主人居所，前面为炕 (*naxan*)，后面为书房。正房旁是二卧房，卧房的炕为万字炕，一如满洲，以南炕为尊。最右面卧房的西墙挂喜利妈妈 (*sirimama* < *Ma. siren* + *mama*)，满文 *siren* 即丝、线，有藤蔓延长之意，故又译作“子孙妈妈”，即女祖宗，其所供奉的对象一般是一条长约十米的绳子，这与满洲在西墙供祖宗版以及家祭换索仪式的“索”相似。但广家是领队大臣的官府，和当时的民居不同，官员、喇嘛进出频繁，喜利妈妈改置于东院旁放米、麦的粮仓 (*calu*)。虽然府内已没有家萨蛮，但喜利妈妈其实就是萨蛮教的遗存。卧房

¹ 广定远对年少时察布查尔的回忆，与欧麦高2006年夏在七牛录访谈当地故老1944年以前锡伯地区的记忆基本相同。见Max Oidtmann, "Imperial Legacies and Revolutionary Legends: The Sibe Cavalry Company, the Eastern Turkestan Republic, and Historical Memories in Xinjiang," *Saksaha*, Vol. 12, 2014, pp. 65-69.

² 广禄《锡伯族一部份自奉天西迁新疆伊犁史》，《中国边政》第197期，2014年，第8页。

³ 光绪8年(1882)锡伯营8牛录各立义学，教授满语，后兼教汉文。20世纪30年代，即广定远的童稚时候，义学改为公立学校。见锡伯族简史编写组《锡伯族简史》，第104-106页。

⁴ 清代向例，帝、后崩逝后，由继位的皇帝将先帝先后生前穿戴的遗物，颁赐给各王公作为纪念。遗念殿便是专门用来供奉先帝后遗物的房间。



再过去是茅坑和库房，即 xaš (Ma. <xaša) boo，该处放杂物、熏肉，同时供奉狐仙。狐仙，满洲也供奉。大厅左边是子女后辈居室，往前走是厨房和供造饭人休息的万字炕房间，再过去是茅坑。屋外两侧没有烟囱 xôlan，因为屋中不建火地取暖，不需从地下排烟，烟囱改建于屋顶¹；府中也没有索伦杆 (somo)。这是少数与满洲旧俗不一样的地方。

大院最底处左右各有小门通向后花园。花园种有牡丹花、玫瑰，其叶可作茶叶用，还有罌粟花，但多只作观赏，偶尔也做药用，但不用来制作鸦片。种罌粟与俄国有关，俄国为从中牟利，鼓励锡伯人种罌粟，收购后再卖到内地。广定远的祖母喜抽鸦片，广定远因为吸了大量二手鸦片而染病，后终由喇嘛治好。大院最右面设有榨油房；最东面是菜园，有水井一处，内植白菜、韭菜、萝卜、辣椒以供食用。

30年代，大院住有其祖母、父母亲、兄弟、三伯夫妇、堂兄弟共10多人。五叔广睿过世后，其女广玉清因母改嫁，自出生满月后亦住于家中，由广定远母亲哺乳养大，广定远视之如亲姊。大院雇有家丁，含长短工约二十人，看守牛羊二至三人，以及锡伯赶车、马夫二人。

家族除了于七牛录城墙外有封田、家族墓园外²，于乌孙山白石峰 (Šayan Qada) 山脚下名叫 Ĵayastai (蒙语，“有鱼”之意) 的地方拥农田二万亩³，田为旱田，种麦、玉米，需挖洞藏雪水，以作灌溉之用；并有牛约二、三百头、马三百多匹、羊过万头、骆驼数十峰，骆驼数目虽然相对的少，但身价却最高。牧地雇有家丁照料，全为哈萨克族，总管名霍伽拜，他三代都是牧场管家。

广定远在七牛录长大，没有到过内地城市，汉化不深。家内只用锡伯语，由长辈教授，但不措意于书面语的学习。启蒙的方法是将十二字头的第一字头写在木板的两面，系以绳子，挂于脖子上，因此即使奔跑跳跃，木板怎么翻动，总能看到第一字头。第一字头通了，其他字头就不用教，自动明白。那时的锡伯语，还是用传统的满语学习，与1947年改革后取消了第6元音 ô 不同。七乡的人，读书人多，常被汉人称作羊皮秀才，即穿着朴实的读书人之意⁴。广定远五六岁时曾读过义学，但因为害怕上学，所以没念几天就没有再去。平日以照顾马、牛、耕田消磨时间。由于只学满文，不学其他，因此后来到台湾上学时，汉语、数学都不懂。

七牛录，亦如其他各牛录，城内族人全说锡伯语。因为地处新疆，来往的人都是维吾尔、哈萨克人、蒙古人，因此都兼说维语、哈语及简单蒙语；但不说汉语，因为除了偶尔有汉人小贩到城里来，周围没有汉人，而且这些小贩，如前所述，都能勉强说上几句锡伯语。广定远当然也不例外，他也通晓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当时说书人说三国只用锡伯语，不用汉语。说书人喜说三国，这和锡伯人喜欢关公有关。关公，满洲人也喜欢。广定远谓说书人以前就有，《无圈点档子》内提及满洲开国神话的穆克什克 (Muksike) 就是⁵。但1949年各牛录城墙打掉后，开始与外族杂居，五牛录的外人多维族，六牛录多汉族、八牛录多哈萨克族，语言开始变得不纯，并逐渐丢失。

由此可见，广定远自小就在说锡/满语的雾围下长大，他所住的四合院就是典型的旗人之家，只是他视之为当然而不知其间的布置与满洲有关。

四、从迪化到内地：乡音未改

迪化

¹ 广定远曾到过位于河北省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县内房子的烟囱也建于屋顶。

² 据广定远说，察布查尔只有广家有家族墓园。

³ Šayan < Šanyan, 白也, Qada 峰也。

⁴ 这里的羊皮指的是用成羊造的衣服，较由幼羊造的便宜。

⁵ 《无圈点档子》是入关前以老满为主写成的档案。旧称《旧满洲档》，近日改称《满文原档》。



广定远年幼时，父亲不在身旁。3岁时，父任塔什干总领事（1934-1938）。1938年11月，又为盛世才迫害下狱，并不准家人探视，其家财产被充公，包括位于伊犁市内俄罗斯社区的洋房二幢、羊万多头、牛、马约千头、骆驼15-20匹、卢布8万。

1944年10月，广禄因吴忠信接任新疆省主席而获释，张治中任命他为中国国民党新疆省党部执行委员兼社会处处长，后再任命为国民党新疆省党部执行委员，广定远因而随父住于迪化省政府官邸。广定远虽然在迪化的正规学校念书，但只待了几个月的时间便得随父亲到南京，因此其时汉语仍不甚通晓。母亲与兄长九善，因要照顾家产，故留在新疆，并未随行。没想到匆匆一别后就再无法与母、兄相见。

当时正值盛世才统治时期。盛世才特别注重青年教育，在迪化成立了“锡伯、索伦、满洲文化促进会”¹。这让广定远觉得满洲与锡伯是两个不同的群体。不过这两个看似相异的群体，其实同属满洲，族群称谓之不同是用以区别原来的满洲与后来加入者之别。这个“锡索满文化促进会”名义上是让青年接受教育，为妇女成立识字班，但同时可以施以监控。不过，迪化由于与内地地理隔绝，人民对中央普遍有疏离感，最终发生了“伊宁事变”。所谓“伊宁事变”即1944-1949年在伊犁、塔城、阿山（今称阿尔泰）“三区”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柯尔克孜人因得到了俄国的资助，建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汉人除了会说维语的，军公教人员通通被杀。广定远目睹当时情形，汉人被杀者多致血流成河。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原欲聘请广禄为“内政部长”。不过，广禄反对分裂，要维护中国统一，结果投奔迪化政府，并建议张治中与东突组织新疆省联合政府。张治中与广禄实为旧识，往来密切，广定远还记得与张治中女儿在迪化家里一起看彩色电影。他说组织联合政府实出于其父的建议，而一般史书如张治中和吴忠信的回忆录都失载。

南京

1948年夏天，广禄获选为第一届立法委员，遂离开迪化，广定远也随父亲到了南京。毕竟，要他到内地受教育原是他父亲计划内的事。广定远记得早上九时由迪化坐飞机出发，中经哈密，到兰州时已近傍晚。在兰州，第一次坐黄包车，但广定远说人拉人的感觉并不好受。从兰州再经汉口到上海。在上海先住在南京路的南京大饭店，第一次看见霓虹灯，吃到蕉皮没有变黑的黄色新鲜香蕉。亲家高等法院院长何崇山送来金华火腿²，原来一般人应吃上一段时间的，他没几天就把火腿当羊腿吃完了。从上海，广家再坐火车到南京，坐火车也是广定远的第一次。从广定远这几个的第一次，可见当时察布查尔的闭塞。

到南京后，广禄在南京成立天山学会。学会位于中山东路利济巷35号，同时亦是新疆省驻京办事处。办事处为一二层楼西班牙式建筑，下面办公，上面住人。自天山学会成立后，广家便搬到那儿居住。广定远曾亲闻家中谈及李宗仁贿选副总统，记者每名送20条金条，国大代表则每名给40-50条。中国事务已慢慢介入了他的生活经验。

上海

在南京待上了大概一年，原来打算到香林寺小学上学，但由于局势动荡，又得离开，结果又错过了学好汉文的机会，但却意外保留着母语，未受污染。1949年，时局紧张，于是匆匆从南京坐火车到上海，暂时住在提篮桥前租界区舟山路一间英国式房子的三楼。3月26日³，从上海龙华飞机场坐美军运输飞机到台北松山飞机场。当时广禄一家除了广定远外，随行的尚有苏美琳、广淑媛（前夫之女）、在南京出生的广树诚、舅舅苏精一。堂姐广玉清因故留在南京，直到“改

¹ 伊犁锡索满文化促进会，原称伊犁锡索满文化促进总会，1939年成立。据1944年促进总会所开列的主要办事人员名单中，广禄是促进会19名委员之一，其任命应在今年10月后，其时盛世才被调离新疆，广禄从狱中获释。见贺灵《锡索满文化促进会概述》，载于<https://site.douban.com/125457/widget/notes/4971340/note/615192881/>。

² 在迪化时，何崇山认广玉清为干女儿，后与何崇山的儿子结婚，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嫁。

³ 广定远指出到台湾的日子他记得很清楚，不是如锋晖编《广禄回忆录》173、184页所记的1949年4月25日。

革开放”后始有机会重逢。

由上可见，广定远到台湾前，生活颠颠，席不暇暖，没有系统学习过汉语，因而一直保持说锡伯语的习惯，以致乡音未改。随着当立法委员的父亲播迁，他的地理空间也开始扩宽，不再局限在新疆伊犁，中国这个词更实在地出现在他的视野内¹。

五、台湾：家族的满文传承

满语家族

到台湾时，广定远约 14 岁。踏出松山机场时，第一次见到水牛。汉文是到了台湾才正式学的。先上龙安小学，念了三个月，为的是要拿小学文凭以便升学。初中念台北商业职业学校，后以新疆籍（不是满族）学生名额，获保送上建国中学和台大政治系。

广家来到台湾，先在阳明山众乐园住了 3 个月，再搬到泰顺街 18 号，住处对面是温州街 16 巷，那儿是台大宿舍。沈刚伯、芮逸夫、夏德仪、董作宾都住在该区，画家黄君璧也住在附近。广家可以说是往来无白丁。广定远跟罗家伦最熟，常到他家喝酒聊天。1966 年，搬到新店的立法院地，邻居为达斡尔人德古来（1904-1995）²，他与其父亲同为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也有共通的语言，达斡尔人也会满语，声气互通，但用的是书面语，不是口语³。

台湾这个新环境对广定远学汉语有帮助，但因为汉语是年纪稍长才学，所以即便在台湾住了 60 多年，说话时仍带有浓重的锡伯口音。广定远之所以没有丢失母语，是因为广禄在家中仍坚持用锡伯语。弟广树诚（Qantinger），乳名 Bobuji (Ma. Boobai jui)，意即“宝贝儿子”，因在南京出生，未在边疆待过，锡伯语听得懂但说得不流利。留在南京的堂姐广玉清，锡伯语能说却不能读。广定远到台湾前，虽然能说流利的锡伯语，但未有系统学习过满语书面语⁴。1956 年，广禄送广定远《清文总汇》一册，鼓励他继续研习满文。广定远说自己正式学习书面语要到 1962 年才开始，广禄用台大历史系所编的《满文读本》（Manju hergen-i xôlara bithe）为教材，教他学习满文书面语。

在广家，长辈大都能听、说、写锡伯语⁵。大家长广禄是台湾满文研究的开山。他主导研究的《无圈点档子》是大家都知道的。他的学生包括陈捷先和李学智，也教过很多外国学者。

继母苏美琳，曾任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的顾问，但不挂名。苏美琳，家中三姊妹中的长女，舅舅苏精一，家中独子，性聪明，故其父亲取其名为“精一”，盼其为学不要涉猎太多，而能专精于一。除满洲语外，苏精一还精通汉语、蒙古语、日语、俄语、英语等五种语言⁶。苏精一的主要贡献是协助日本学者服部四郎和山本谦吾编写《满洲语口语基础语汇集》（1969）。这本词汇汇集反映的多是城市知识分子的话，农村的用词，如农具的字，像锄头(yangsaqô<yangsambi)等则多阙如。

跟广禄不一样，舅舅苏精一与内地的关系不深。他喜欢俄国。在他父亲的影响下，自幼也非

¹ 广定远说在新疆时，他不是没有一个比察布查尔更大的 *gurun boo*（国家）的概念，只是不知有“中国”。

² 德古来（1904-1995），又名吉尔嘎朗，达斡尔人，与广禄同为国民政府立法委员。1924 年，入北京师范大学，后赴日本留学。1928 年，用拉丁字母创制达斡尔文。他曾在德王手下当财政部长。其弟德古永，又名巴达莱嘎，20 世纪 40 年代毕业于日本广岛文理科大学教育系，通晓达斡尔、鄂温克、满、蒙、汉、日、俄、英等语言文字，是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1957 年任全国达斡尔语文工作委员会委员，曾参与制定达斡尔文字方案。

³ 广定远说德古来告知达斡尔人 6 岁到 12 岁先学满语，12 岁后始学蒙语。

⁴ 参看 Jerry Norman, “The Manchus and Their Language (Presidential Addres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123, No. 2 (2003), p. 489.

⁵ 广禄除满语外，也能说流利的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蒙语也懂，因为有些亲戚是蒙古人。

⁶ 《满洲国之花形—若き“言叶の全権”》，《大阪每日新闻》1935 年 5 月 27 日。



常喜欢日本，一直向往去日本留学¹，最后投向伪满洲国，并归化日本，改名玉闻精一，玉文，即宇文也，以示其为鲜卑后裔。据载，苏精一 1908 年生于八牛录。祖母及父亲皆惠远城(Foroki-be Qarmara Xoton)八牛录人，母属第六牛录。因辛亥革命，3 岁时，移居母亲的出生地第六牛录，一直待到 6 岁。6 到 12 岁，曾回惠远城小住，但因兵乱，八牛录老家被焚，遂寄住在惠远城第一牛录姑姑家，从姑姑学满语，但学的是当时视作为标准的六牛录口音。13-14 岁，因病回八牛录处居住，未几又迁至惠远城的第一牛录，一直住到 16 岁。其间，入汉人学校读书，旋至迪化升读新疆省立中学，除汉语外，也学俄语。1925 年毕业，17 岁，至俄国领属的阿拉木图(Алма-Ата)州立中学继续学业。1928 年毕业，时年 20 岁，复回迪化，入新疆省立俄文法政学校，该校的教学语言俄文和汉文并用。1931 年毕业，时年 23 岁，旋被新疆省政府派往哈尔滨中东铁路局附属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前身)进修，在该校开始学习日语。1933 年毕业，25 岁，赴日本东京，入铁道讲习所。1934 年毕业，26 岁，伪满洲国外交部征聘考试及格，任职于该部宣化司，初为非编制内雇员，属调查处第一课，后外派为驻上海领事²。

伪满洲国灭亡后，苏精一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广定远随参观队伍参观该监狱时，见一人盘腿而坐，重复做着搓洗衣服的动作，状甚无聊，故对此人印象特别深刻。这个人原来正是其舅舅苏精一，可惜当时见面却不相识。苏精一后转移到上海的模范监狱。该监狱位于英租界提篮桥舟山路旁，三层楼高。广定远因为上街买早餐，卖烧饼油条的扬州人小贩认得其新疆口音与狱中的一个人相似，再探听下得知此新疆人正是其舅舅苏精一。后拜托何崇山营救，早上提出申请，下午即获得释放。苏精一留在台湾半年后转往日本，妻子是日本人³，在横滨定居。1957 年左右，在日中进出口公司工作，公司董事长是南乡三郎，南乡三郎曾到北京和毛泽东、周恩来、廖承志等国家领导人会面。苏精一有一年回台探亲，与战前相熟的上海宪兵队长加藤同来，下榻于台北国宾饭店。苏精一大战前后与日本的关系密切，于此可见一斑。1996 年 2 月逝世，享年 88 岁⁴。

“改革开放”后，广定远又与新疆察布查尔的哥哥九善联络上。日本学者河内良弘至伊犁做研究时，其兄托河内将用满文写的家书带至台湾，辗转透过在台满文学者庄吉发和广定远联络上。自此，广定远几乎每年必到新疆，并带回大批的研究材料，包括当地的锡伯语小学教科书。

满文推广

在台湾 60 多年，广定远承其父亲的衣钵，积极推广满文。由于广定远的满语受汉语污染较少，因此，一直到现在，仍是国内外学者请教的对象。学生包括意大利、俄国、英国、美国等外国学者。美国人罗杰瑞(Jerry Norman)，主要研究中国方言，原随其父广禄于泰顺街学满语。可能由于广禄公务太忙，广定远大学三年级时(1956 年)，罗杰瑞改跟他学口语，为时 1-2 年左右⁵。60 年代，韩国学者成百仁来台留学，也跟广定远学满语，用的是朝鲜文版《老乞大》，学了大概半年。回国后出版的《满洲샤만神歌》(《满洲萨蛮神歌》)就是他在台的学习成果⁶。

在台湾，李学智的满学研究也与广定远有关。李学智原来学药剂学，来台后当上了台大图书

¹ 《满洲国の花形—若き"言叶の全権"》，《大阪每日新闻》1935 年 5 月 27 日。

² 参看山本谦吾《满洲语口语基础语汇集》，第 3-4、9、11 页。

³ 据服部四郎 1941 年的记述，苏精一在伪满洲国新京工作时，“找到他理想的日本人结婚成家，已当上了爸爸”。见承志《在日本寻找新疆的锡伯人》(上)，2016，页 4；移居日本后，复娶另一年轻日本女子为妻，“有一子，儿子成家后，自己独立生活”。见承志《在日本寻找新疆的锡伯人》(下)，2016，第 11 页。二文载于 <https://gushi.tw>。

⁴ 据其子玉闻佑的“部落格”记事，2012 年 8 月 29 日。

<http://route16c.cocolog-nifty.com/shyandcutepeople/2012/02/post-4735.html>。2016 年 4 月 27 日参阅。

⁵ 有关罗杰瑞和广氏父子学习满文的细节，可参看 Jerry Norman, “The Manchus and Their Language (Presidential Address),” pp. 488-489.

⁶ 成百仁《满洲샤만神歌》，서울특별시：明知大学出版社，1974 年。



馆阅览组组长。广定远 1954 年入台大，因办理图书证而认识李学智。李学智看见广定远证件上写的新疆籍，乃知其父为广禄，遂请广定远介绍其父亲给他认识，以便学习满文。李学智后来成为广禄的满文助教，并同广定远至雾峰调查《无圈点档子》的收藏情况。后李因故与台大校长钱思亮不合，又由广禄介绍到中央研究院，那晓得钱思亮亦调到中研院当院长，真个是不是冤家不聚头。

从 1990 年开始，广定远在政大民族所教会话，每班约 5-6 人。一学期的课程，每周 2-3 小时，但大部分同学不甚认真。中央研究院曾派人至满族协会的满文班培训，以整理档案，学员包括刘铮云等人，但为时不长，约一年左右。

私人教学，以张华克表现较为特出。一直到现在，张华克仍不定时请广定远开满文口语班，向其请教。广张二人原为台糖同事。后来因为广定远希望发展满文计算机输入法而结缘。张华克对研究满文有极大的兴趣，2014 年他取得中国文化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是《旧满洲档词汇解析法的建立——以清初四组满文词汇释义为例》，并有满洲语文译著数种如下：《清文指要解读》（台北：文史哲，2005）、《清文虚字指南解读》（新店：映玉文化出版 2006）、《尼山萨满全传》（新店：映玉文化出版，2007）。同年在中国文化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是国立历史博物馆研究组组长戈思明，他的论文题目是《新疆锡伯族传承满文之研究》，其论文写作也获得广定远的协助。

广定远曾到法鼓山短暂教授满文，因为法鼓山购入了大陆出版的《满文大藏经》，需要懂满文的人员整理、研究。2013 年，教育部补助广定远拍摄了《满语十二字头教学》影片，以利推广满文学习。

广定远回忆说，1987 年前后，改革开放第一年，锡伯族不到 3 万人，但却有 10 万人会说锡伯语，其中包括维吾尔人、哈萨克人、汉人，这些外族都上过锡伯族的小学，都能说标准锡伯语。大概在 1989 年，广定远回到老家，看到一个维族小伙子在他家院子角落盖房子，这个小伙子居然能说流利锡伯语，而且还懂得用成语 *muciyum maltem* (Ma. micumbi 爬行, maltambi 揩、抹)¹，即“胼手胝足”之意。但过了 25 年，查布察尔懂锡伯语的人越来越少²。就算会说也加进了汉语词汇，如所用的 *baiita aqô* 即汉文的“没事儿”，甚至在谈话中常常直接插入汉语，如“快点”、“干什么”。音调也掺入了维语语音，跟他在上世纪 30 年代的发音有别。东北的满语使用情况比察布查尔更糟糕。他的三个女儿也没学满语。锡/满语言的日渐衰微或许正是他推动满语教学的一大原因吧。

满人组织

除了满文教学之外，广定远又协助成立满族组织，目的是为满族争取权益。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不再积极排满。1946 年，抗战胜利不久，溥心畬会同广禄等人于北京市方家胡同十三号升允故宅成立北京满族协会。1954 年 7 月 1 日，原北京满族协会在台复会，大家仍公推溥心畬为会长³，广禄也是复会的人员之一。

但不积极排满不等于没有阻力。1963 年 3 月溥心畬逝世，“满族协会”因搁置数年未曾开会而被内政部注销会籍。其后，满族协会申请复会并不顺利，经 11 次申请，到 1980 年始获批准。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甚至取消了故宫的满文组。

1981 年 4 月，满族协会复会，广定远积极协助并参与会务。大会于中山堂举行成立典礼⁴。

¹ 山本谦吾《满洲语口语基础语汇集》，第 52 页。杨震远、伊津太、富伦太《锡汉教学词典》，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149、153 页。

² 杨东晓《满语消失，也就是 100 年的事情》，《新世纪周刊》2008 年第 19 期，第 119 页。根据新疆伊犁师范学院杜秀丽教授 2013 年 6 月 15 日于“国际满—通古斯学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在伊犁能纯熟读、写、听、说锡伯语的人，即便用较宽松的标准，亦仅剩 30 人左右。

³ 溥心畬曾被软禁于九份金瓜石前皇太子裕仁南巡时的行馆。

⁴ 见莫乃滇《中华民国满族协会成立的源起与展望》，《满族文化》1981 年第 1 期，第 7-8 页。



满族协会理事长是赵靖黎¹，总部设在台北市罗斯福路时代大厦九楼。协会获得孙连仲夫人罗瑞凤每年捐款 20 万，连续 5 年。罗毓凤，清端王载漪的孙女、孙连仲将军夫人、川岛芳子姑姑²，是协会绩极活跃份子。其后，继任的理事长汪渔洋慨捐 50 万元支持协会。满族协会的一项重要活动是满语教学。这个满语班，每周上课，每次 2 小时，最多每班十多人，最少也有七、八人。多年来来学者共几十人，包括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叶高树等。在台湾解严之后，中华民国满族协会已转型为纯粹的民间团体，不再具有官方色彩。

20 世纪 80 年代初，广定远又协助罗毓瑞（毓子重）成立纽约世界满族文化基金会。罗毓瑞，溥心畬的私生子，从事珠宝买卖，为基金会终身会长。基金会原获哈佛燕京社庚子赔款拨款赞助，但因故未能成事。满族协会理事长赵靖黎的弟弟赵枫来原内定为沈阳分会联络主任，后以其只为小学教员而被撤换，结果引来反弹。

六、锡伯人乎？满洲人乎？

有趣的是在大力推动满语教学及成立满族协会的同时，广定远却说自己不是满洲人。虽然对满人有亲切感，但他强调自己是锡伯人。他说文化上满锡相近，但血统上却不相同：锡伯是鲜卑人的后代，且有科学证明³。

广定远之所以认为自己是锡伯，不是满洲，跟他年轻时的生活经验有关。广定远年幼时，受家庭外的客观环境影响较深。广禄不是常年在奔波，就是被长期关禁在狱，父子难得见面。他小时候生长在盛世才统治新疆的 30 年代。那时，察布查尔，如上所述，仍是个封闭的社会，平日交往的多是同族锡伯。当时，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同属伊犁四营，即“外八营”，与另属满洲营的满洲分立⁴。后来，盛世才成立的“锡索满文化促进会”，从名字看，也是满洲、锡伯对立。1947 年，锡伯说的语言被认定为锡伯语，不是满语。1954 年，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Cabcal Sibe beye dasangya siyan）成立。这些都加强了他觉得锡伯是独立于满洲的看法。广定远说满洲对他而言是“腐败”的满洲，因为满洲人汉化，丢了自己的文化。不过，由于锡伯与满洲文化与语言相近，他对满洲并不完全排斥，但他总觉得这种对满洲的亲近感多少带点勉强和无奈。

他父亲广禄却自觉是满洲人。广禄说：“锡伯族乃构成满族的一份子。”⁵又说锡伯族之文化习俗，与“东三省满族完全相同，每一旗都奉祀关帝庙，孔子庙外尚供奉其他诸神，饮食衣着大体与汉族同”⁶。观乎上面有关广家伊犁大宅的描述，实信而有征。广禄在台的妻子苏美琳也说：“余乃满洲人之内锡伯也（Bi oci Manju niyalma-i dorgi Sibe inu）。”⁷连“他者”溥心畬也认为锡伯是满族。如上所说，满族协会先后二度成立，广禄也被接受为发起人之一。

虽然广禄说自己是满族，但与满洲似乎又保持着一点距离。在《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序中的字里行间，我并没有察觉到他有满人翻译民族遗产的激情或自豪感。他撰写的《回忆录》中也多以新疆、锡伯的眼光看问题，而少以满人自居。他成立的中国边疆历史语文学会只出版过《西

¹ 赵靖黎，国大代表，曾任东北农业银行行长。

² 据广定远所言，川岛芳子的被捕乃由其姑姑以吃水饺为名，诱使川岛至其家，让国民政府将之逮捕。

³ 可参见于长春、李文荣、谢力、张小雷、周慧、朱泓《新疆锡伯族人群线粒体 DNA 的遗传学分析》，《吉林大学学报》（理学版），2007 年第 5 期，第 868-872 页；赵欣、于长春、朱泓《从分子生物学角度看鲜卑族的流向》，《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0 年第 1 期，第 34-37 页。

⁴ 龚义昌《锡伯族姓氏考》，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 年，124 页。锡伯到伊犁后未照盛京之旧例编入满洲或蒙古八旗，而如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分立。此乃因应时势而为，并不表示已入旗的锡伯不属满洲。见吴元丰《清代伊犁锡伯营综述》，260 页。

⁵ 广禄《锡伯族一部份自奉天西迁新疆伊犁史》，《中国边政》第 197 期，2014 年，第 7 页。

⁶ 广禄《锡伯族一部份自奉天西迁新疆伊犁史》，《中国边政》第 197 期，2014 年，第 6 页。

⁷ 见 Mergen Guwargiya, “Enduringge Šuxowan[Šuxôwa]-i Ulabun,” p. 170.



藏研究》(1960)、《新疆研究》(1964)、《蒙古研究》(1968)等书,独缺《满洲研究》。我想这多少与当局对满族仍有偏见有关¹,观乎满族协会申请 11 次才成功可知。当局把他标签作新疆的立法委员,而不是满族的立法委员。广禄懂满文,但他只是懂满文的新疆锡伯人。政府政策如此,广禄以锡伯为主,少谈满洲是自然之事。广定远跳过满洲部分,直接认同于锡伯,与此或有关连。

其实,锡伯之于满洲,犹如八旗内的蒙古、汉军之于满洲一样,都是旗人,亦即满洲人,并不矛盾。锡伯就包含在满洲这个大概念内。在清代,入了旗就是满洲人。锡伯自康熙 31 年(1692)从原属八旗蒙古的科尔沁拨出,以 30 两银一丁卖了给满洲,正式改编入满洲上三旗,属“伊彻满洲”(Ice Manju)。乾隆 29 年(1764),锡伯作为旗人西迁伊犁。同治回乱后,因语言相通,惠远城的新满营即由锡伯营拨补²。自康熙到民初,锡伯入旗已 200 多年,文化惯习基本上早已满化。因此,锡伯与满洲,大同小异。

广定远认同锡伯,看到的是满锡两者间的“小异”,但他同时感到难以排斥其属于满洲的“大同”身份,否则便不会教满文,帮助成立满族协会。在他这双重认同中,锡伯是其核心认同,是根源于他小时候生活经验的形塑,他对满洲的亲切感,应与满锡语言的相近性有关。他说锡伯语音近满洲。上世纪 90 年代初,他曾至东北的三家子村考察,与一八十多岁的赵姓老人谈话,发现老人的口音与他的完全相同³。

有关自己的双重认同,广定远有时感到迷惘,觉得无奈,他是锡伯,又似是满洲。他的解释是锡伯是小群体,故不得不依附在满洲这个大团体上才能发声。其实,族群认同是多元的,可视情况而选择呈现其中的一种认同:在锡伯人之间,如在察布查尔,他强调自己是锡伯人,合理自然;在满族之中,如在他协助成立的满族协会,他是满洲,有其一体感,也不矛盾。他是满洲大群体中的锡伯:Manju uqsurai Sibe aiiman-i niyalma(满洲族锡伯部的人)。明乎此,则可知生于中华民国的他,跟随作为立法委员的父亲,在锡伯、满洲认同上又加上中国认同。广禄说:“我一面以作中国人为荣,抑亦以三数万未被同化之锡伯族为骄傲,民族感情如此重要,藉此可见其端倪。何况爱本族与爱国家并无冲突也。”⁴广禄改其子汉名为定远,即由中国内地往边疆看,可见广禄对他的期许。在《满语十二字头教学》影片的导言中,广定远开宗明义说:“满语文是我国满族的语言文字。”可见他认同中国这个国家。

七、结 论

如何从满洲、锡伯间作出认同,是广定远一直面对的问题。在他的经验中,他是新疆的伊犁人,即便到了台湾仍以锡伯认同为主,认同满洲只是迫不得已的事。广定远对锡伯有很强的情意结,他的锡伯认同是源自鲜卑的记忆,对满族没有太多的共鸣。他和满洲有较多的感情上的联系主要在满语文,但这无法唤起他对满族的原生族群感情。虽然他祖上是旗人,但他没有将之和满族联系起来。离开了新疆,或由于父亲的影响,又逐渐有了中国意识,变成中国的新疆伊犁锡伯人,但不是满洲人。如果他理解锡伯是满洲的部分,问题当可迎刃而解。毕竟他祖上是旗人,亦即满洲⁵。

¹ 翁福祥《台湾满族的由来暨现况》,2004 年。<http://www.manhusoc.org/contents/history.htm>。2018 年 4 月 15 日参阅。

² 广禄《广禄回忆录》,6 页。

³ 广定远、张华克《三家子村满语调查记》,《满族文化》第 20 期,1994 年,55—60 页。广定远、张华克《三家子村满语调查记》(下篇),《满族文化》第 21 期,1995 年,91—94 页。广树诚《寻根之旅》(一),《满族文化》第 25 期,1999 年,44 页。

⁴ 广禄《锡伯族一部份自奉天西迁新疆伊犁史》,《中国边政》第 197 期,2014 年,9 页。

⁵ 在完成与笔者的访谈后,广定远似已认知同时认同锡伯与满洲并不矛盾。在近日给报刊记者的另一次访谈中,他言词间便没再排斥自己满洲人的身份。见陈怡杰《自边陲异境走来台湾唯一锡伯族人广定远》,《上观》2018

